

第 一 章

恩将仇报 狼子野心

—— 日本侵华思想的由来

以 东条英机之流为代表的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疯狂发动和不断扩大侵华战争。在 1931 年至 1945 年间，日军铁蹄践踏了中华大地，所到之处，凶残暴虐，对中国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血腥屠杀，使中华民族遭受了空前的大劫难：中国军民伤亡 3 500 多万人，其中死亡人数达 2 000 万 流离失所在 1 亿人以上，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 1 000 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高达 5000 多亿美元，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从而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上写下了最可耻的一页。

回顾 2 000 多年的中日关系史，日本如此残暴地虐杀中国人民，践踏中国大地，确实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

早在 2 000 多年前，中日两国这一衣带水的近邻已开始了友好交往。在近 2 000 年间，日本从中国学习和引进了大量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日本从野蛮走向文明，从落后逐渐发展到先进，是受惠于中国的。

若从更久远的洪积世、旧石器时代考察，亦可发见中日两国之间已有通交关系，大量的出土遗物和遗迹等考古学、地

质学成果可充分证明这一论断，这已成为中日两国学术界的共识。就是日本民族的族源问题，亦有中国大陆“江南说”和“东北说”而“日本人种中杂有中国人种的血统”则是中日两国民族学学者的共识。

在远古时代，中日之间是有陆路相连的。只是在 1 万年前因海面上涨，才将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分开，茫茫大海才将中日两国阻隔成一衣带水的邻邦。虽然在地理上有一水相隔，而在文化上，由于位置相近，先人们不畏艰险，仍冲破险阻，进行友好交往，自古以来就结下了相互影响、彼此浸润的源远流长的不解之缘。

在中国已发展到封建社会历史阶段，日本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社会后期和部落联盟历史阶段，尚未形成国家时期，由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中日间最初的交往，是以日本多方面受到中国经济、文化影响而开展的，终于使日本发展成“汉字文化圈”或“儒学文化圈”的重要一环。

这种影响，从上层统治者逐渐扩展到下层平民百姓，从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经济结构逐渐深入到精神生活、文化艺术和整个意识形态领域。

在周秦时代甚至更早以前，中日两国人民已有往来。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日益频繁，逐渐由民间的经贸往来发展到国家间的政治、经济交往。中国正史中关于日本的首次记载是《汉书·地理志》的一段话：“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古代日本的国名为倭，倭人即指日本人。中国的汉式铜镜及两汉之间的王莽新朝的货币，均在日本有大量出土和发现。东汉时日本对中国更进一步发展为“遣使奉献”或“奉献朝贺”了。《后汉书》的《东夷列传》中

已将倭列为专传，并做了比较详细的记载。比《后汉书》成书早约 150 年的《三国志》的《魏志·倭人传》对日本列岛情况作了更为详尽的记载。《魏志·倭人传》的记载，十分清楚地说明当时日本列岛在政治组织等方面均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隋朝仅 38 年，日本就曾 5 次派遣使节，其中 3 次还随带着留学生和学问僧，充分表达出日本输入中国文化的迫切愿望。当时推古天皇的摄政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即官制官位 12 等级）、“宪法十七条”和使用历法等，均显然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在中国刺激和影响下所进行的推古朝的一系列改革，提高了皇室地位，加强了中央集权，适应了日本社会需要，加快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到唐代时期，中国已发展为文化繁荣、法制完备的封建大帝国，而当时日本正处于社会制度新发展、大变动时期。为引进唐朝的先进文物制度，从 630 年至 894 年的 264 年间，日本共任命遣唐使 18 次，到达中国的有 15 次。一般每次 200 多人至 500 多人，最多的一次达 651 人。遣唐使团在中国全面学习中国的经学、佛学、医学、文学艺术、天文历法、建筑、手工业技术及政治、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亦将大量的唐代书籍带回日本。先进的唐文化对日本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日本不仅移植了唐的政治制度、土地制度和军事制度，而且将唐的法律、哲学思想、宗教、教育、文学、乐舞、书法、工艺美术、史学、医药、历法、建筑、体育娱乐、衣食风俗等均广泛引进和吸收，这对日本律令制度的完善、文化水平的提高，从而较为顺利地通过大化革新而进行日本社会制度的变革，均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因为日本“中古之

制度”多“模仿唐制”形成“全面唐化局面”因而在长达300年的日本“唐风文化”时期，日本社会历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隋唐时期的中日交流，“日本历史本来会是另外一番景象”的。

从唐末到清末，中国文化虽不似隋唐时期那样频繁、大量地传入日本，但亦是不断地、持续地传到日本，从而使中国的较为先进的文化施其影响于日本。900多年间，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依然是十分广泛而深刻的，主要有以下一些表现得较为明显的领域。佛教方面是中国传入日本的禅宗及用中国传入的佛经创立的日本净土宗。禅宗的传入对日本文化特别是建筑、绘画、有关茶道及陶瓷器等诸多领域，均有很深刻的影响。在儒学方面，以程朱理学为主的宋学在日本广泛传播，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一大势力，并在日本实际社会生活中发挥很大作用。在日本江户幕府时期（1603—1867年），宣布朱子学为官学，以其大义名份、伦理纲常等维护德川幕府的“幕藩体制”。明末遗臣朱舜水到日本，为水户藩主诸侯德川光圀（国）之宾师，水户学派的实学主义、尊王思想、正名论等思想，受朱舜水影响颇大，不仅影响及于当时，对明治维新前后尊王倒幕思想亦有相当影响。宋学分化出的古学派和阳明学派，对明治维新思想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总之，在整个古代时期，总的情况是日本受惠于中国。在近两千年的交往中，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如果没有这种长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日本后来的历史发展将会是另一种状况。当然，即使在古代时期，也有部分领域，或某些局部存在中国向日本特长学习的情形。总的看友好交往是主流。也有过三次规模大、影响深的中日之间的战争。第一次是663年

日本发动的干预朝鲜半岛诸国间的政治、军事纠葛，唐朝高宗亦企图控制朝鲜半岛而在朝鲜白江口（今锦江口）进行的中日间第一次战争——白江口战争。结果是唐朝与朝鲜新罗联军打败日军，挫败了日本中大兄皇子为首的领导集团控制朝鲜的野心。第二次中日之间的战争称“元军征日”。蒙古奴隶主在灭宋过程中及灭宋后，两次发兵侵略日本，元朝忽必烈为胁迫日本臣服元朝，实现其扩张的野心及垂涎日本的黄金（当时盛传日本是黄金国），于1274年（日本文永11年）和1281年（日本弘安4年）两次东征日本，遭到日本人民英勇反抗，最终惨败。日本史称文永、弘安之役。第三次是1592年和1597年，通过战国群雄混战而实现日本统一后不久，实际统治日本的丰臣秀吉为实现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狂妄野心，两次发动侵朝战争，明朝政府应朝鲜要求出兵朝鲜援朝卫国，组成中朝联军，奋击日军，粉碎了丰臣秀吉占朝鲜进而取中国的战略企图。这三次战争留下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侵略者最终必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日两国间，应以“讲和为主，罢战为强”，睦邻友好，平等相处，互通有无，才是共同繁荣的最佳之策。

但从丰臣秀吉首次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印度，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后，日本不少统治者及一些思想家，总不断地鼓吹其计划，致使日本侵华思想在300多年间不绝如缕且日益猖獗。

丰臣秀吉1585年出任“关白（摄政）”，总摄日本国政，1586年又任太政大臣，掌握日本政权后，为解决统一后的日本社会矛盾和个人野心不断膨胀及霸权思想作祟，提出和采取了对外扩张的计划和政策。据史书所载，丰臣秀吉在1578

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征伐播磨国（今兵库县）时，就对织田信长说：臣“必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织田听后笑曰：“汝可谓大胆！”1585年，丰臣在大阪接见日本耶稣会副管区长柯艾留时，曾首次明确提出“征讨中华”，他说：“如今已征服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的名声和权势遗留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之后，将让日本于兄弟（羽柴秀长），自己为征讨朝鲜和中华，决意渡海。为此，采伐木材，造船舰二千，率军出征。”1590年5月，丰臣致书朝鲜国王李 昖：“吾欲假道贵国 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中国明朝），使其四百洲尽入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此乃吾之宿志也。”当他得知1592年第一次侵朝战争初期顺利进军消息时，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他于5月18日从名古屋写信给在京都的关白丰臣秀次（秀吉的外甥，后收为养子）说：朝鲜京城已陷落，自己“急湏渡海，此行将直捣大明国”，并让秀次准备日本迁都北京，而北京“城周围十国（县），可贡圣上（天皇）御用”；“周围百国（县）归你（秀次）领有”，日本国本土交由他人统治。6月，丰臣又写信给大阪城内的妻妾，明确地声称：他自己将“乘日本船渡海，居守宁波府”因为宁波府“近天竺（印度）以便“遵圣意，占领天竺”。廖廖数语，野心毕露，亦暴露了他利令智昏的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正当丰臣做黄粱美梦时，传来了日军在中朝联军打击下节节败退的消息，被迫议和撤军。1596年丰臣又撕毁停战和约，于1597年再次出兵侵朝，亦很快陷入困境。丰臣亦忧忿成疾，悲凄地呜呼离世。临终前，忽张口曰：“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言毕而死。

丰臣死后，德川家康通过1600年的关原之战，确立了统

治全国的地位，并于 1603 年建立江户幕府，成为合法的全国统治者。德川家康依然企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秩序。1610 年，以幕府执政本多正纯的名目，实由大学头林罗山起草了致中国福建总督的信函。该函称：日本国主源家康已统一全国，“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环球称臣，他如安南、交趾、占城（均为今越南）、暹罗（泰国）、吕宋（菲律宾）、西洋（指新加坡以西）、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莫不献表纳贡”。此信所言并非均是事实，亦不知是否交到了中国。但它却具体而清楚地表达了德川家康追求的政策目标。日本外交史家信夫清三郎曾有过著名的论断，“在日本人中”“像林罗山那样认为朝鲜是向日本‘入贡’的国家”这一观念“相当强烈”，“想把朝鲜置于日本统治之下的情绪，一有机会就要爆发出来”。

作为德川家康所建江户幕府的“在野反对派”，著名的剑道家宫本武藏（1584—1646），受传统武士道精神支配，一生中表现了日本武士阶层传统的好勇斗狠和极端残忍性，动则下毒手，致人死命。这些在日本古典戏曲中都得到长期表演，他的传奇故事广泛流传，战前还出版了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宫本武藏》成为畅销书。宫本所著《兵法三十五条》将自己平生练功、惊险决斗体会及剑道新派别的要领、兵法奥妙均详细写明。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经常鼓吹、宣扬宫本的做法及精神，为侵华战争服务。

建立起日本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1622—1685）。他将毕生的精力倾注在建立武士道的理论上。他以儒家思想论述“武士道”，著有《武教全书》、《武家事记》、《兵法问答》等大量著作，至少有 600 多卷。他

聚众讲学 亦是著名的兵学家 有弟子 4 000 余人。其子的门生中有一位是后来明治维新先驱者吉田松阴的祖辈，故吉田松阴称山鹿素行为“先师”，并在松下村塾讲授素行的兵学，明治维新的不少志士均受到素行思想的影响。从 1192 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后，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成为统治阶级 直至明治维新 对日本统治长达 600 多年。其“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儒家思想融合 逐渐形成武士道。“武士道”是封建武士应该尽的义务和职责 包括效忠君主、崇尚武艺、讲究“信义”、“廉耻”等封建道德规范。武士道在江户时代以前，还只是一种“实践道德”。到山鹿素行时 才从朱子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遵“忠节”、“武勇”、“义理”等儒家伦理道德 表现出“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安天命”、“尽忠孝 讲仁义”等作为武士修养的内容，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的本份，向武士灌输“忠于主君”“不顾身家”的思想 还要有“报恩、克己、面对死亡而不动摇的勇气”。并规定了一套繁杂的道德规范、规矩和礼法。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被大加宣扬。素行的“武士道”理论，后来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 经常以“武士道”精神“征战光荣”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使其充当征服世界的侵略战争的炮灰。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儒家尊王思想和神道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主张日本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神神相生、圣皇连绵”；“与天地无穷”以便维护万世一系的“国体”这些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

将日本尊皇思想充分阐发的是日本国学集大成者本居宣

长(1730—1801)。他把日本说成是天照大神创造的神国,提出了日本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崇天皇的思想。他还宣扬“八纮为宇”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即将世界各国置于日本支配之下 梦想征服世界。还声称“世界万国之中最优秀之国 惟我天皇统治之日本国”对天皇只有绝对服从。他倡导的“神道”精神,尊皇和日本优越等观念,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 变为“国粹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舆论工具。

从 18 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力倡开国论、海防论、海外雄飞论及攘夷论的经世学派、维新运动先驱者们,都为日本近代推行的对外扩张的世界战略,提供了大量的思想素材。其代表人物有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渊、藤田幽谷、会泽正志斋、吉田松阴、岛津齐彬等。

林子平在《三国通览图说》(1785 年著,书中三国指朝鲜、琉球和北海道)中,全面介绍朝鲜 8 道、琉球 3 省 36 岛和虾夷地(北海道)的历史沿革、文物制度、风俗习惯、地理物产等情况,供日本人了解周边国家和地区。1786 年林子平又著《海国兵谈》纵论五大洲形势 提醒国人勿忘“江户(今东京)日本桥下水 直通中国与荷兰”勿忘日本是四周为海洋环绕 与世界联在一起的“海国”启迪世人站在日本桥上,放眼世界风云。一部《海国兵谈》实为海国日本武备的百科全书,论述了日本海防必做到攻守兼备,又具体提出了各项防卫措施、依次论述了水战、陆战、军纪、战略、夜战、选士、编制、行军、兵器、辎重、攻城、守城、操练等。在经世学派中,最早论述海防论者正是林子平。而海防论除了研讨海国危机,为寻求经国济世之策,忧思焦虑,构思应对西力东渐之策略等正面、积极的作用外,海防论亦为近代日本

武力扩张论的兴起埋下伏笔，从总体上为构思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近代世界战略奠定了基础。林子平把日本进攻的目标确定在日本邻近地区，他在《海国兵谈·自跋》中说道：“著述《三国通览图说》的目的‘在于明确日本之三邻国朝鲜、琉球、虾夷地（北海道）之地图’，‘使日本英雄率兵进入此三国时能牢记此图以应变’”。他还在《海国兵谈》中露骨地表露了霸权主义思想，他希望日本能出现如俄国女皇叶卡捷林娜二世那样的“君主”，以“一统五洲”。而在推行其世界战略的基本手段方面，则主张武力对外扩张。他认为：“治世不忘战，乃保卫国家之道”，在论述海国武备时，主张文武兼顾，以武为先。正因为林子平对日本近代发展有这些作用，所以在其作古多年之后，日本统治阶级仍对其感念不已，褒奖有加。1882年和1918年明治天皇和大正天皇分别追叙林子平正五品、正四品官位，引其为精神上的肱股之臣。

仅比林子平小6岁的本多利明，亦和林子平一样，主张对外开发和殖民，也把叶卡捷林娜二世作为理想的形象。本多利明在1798年所著《经世秘策》一书中，主张确定世界战略的极终目标，即征服世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强国。他认为，日本须“渐次兴业，取得大成就”，以使“东洋的大日本岛”，与“西洋的英吉利岛”不分高低，进而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富国，第一大强国”。他指出，使日本成为“天下第一最善国”之办法，在于“建立大量生产精巧奇器与名产之制度”和“建立以官船运输贸易来通天下之有无，救万民之饥寒的制度”。如果日本生产“奇器名产”，“以本国之产品易外国之金、银、铜，获得金、银、铜之利润”，则日本将“终成大国，成为富饶强盛之大国，得永世不变之大治，如大

火亦不能烧毁之石屋，使万民皆大安堵”。他认为，西方各国强大之原因亦在于此，并一语破的道：“与外国之交易乃为提高自身之国力，亦与战争相同耳”。为使本国成为“大国”，本多利明还要求日本实行殖民“开拓制度”。他指出，“欧洲各强盛国家其本国虽小，但多有属国，亦堪称大国”，强调“即使侵犯他国，也应由此而增强本国，是乃国务”。他还划定日本北攻、西侵方向，其主攻方向为堪察加、满洲（中国东北）、“山丹”（现俄国滨海边疆区）和“西唐太岛”（库页岛）。他主张把大日本岛的国名改名为“古日本”，把“本部”（首都）迁到与英国伦敦同一纬度的堪察加，在与巴黎同一纬度的“西唐太岛”建筑大城郭，更加发展与山丹和满洲的贸易，甚至欲将中国和美洲大陆作为“扶植日本国力之地”，先进攻满洲、库页岛等地，以完成“大日本帝国”的建设。本多利明还在 1801 年所著的《贸易论》中，颂扬征伐朝鲜的丰臣秀吉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是日本历史上的“英雄豪杰”，然后阐发了他的以武力扩张为核心观点的贸易论。他宣称：“发动战争，谋取国家利益乃是为君之道的秘密”并进而将“贸易之道”概括为“战争之道”，鼓吹伺机“进攻外国并占领之”。

将经世学派思想主张充分展开、发挥的集大成者是佐藤信渊。他在 1823 年的《宇内混同秘策》首句中即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乃世界万国之本”。他所追求的目标是将全世界“混同”为日本郡县，使“全世界悉为皇国（日本）之郡县，万国君主皆为臣仆”，“皇化”全球，主宰世界。他提出“皇国”驾驭世界之策的外征论，更把武力扩张作为“皇化”世界的基本手段，将出兵海外的侵略行为美化为“奉

天意正万国之无道”是“实行天惩”。佐藤信渊在《宇内混同秘策》的总论中，详尽地陈述了征服中国的主张和行动步骤。他宣称：“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先以吞并中国开始”，“当今，于世界万国之中，最易为皇国攻取之地，莫如中国的满洲（东北地区）”。满洲之地与日本仅隔水相对 800 余里，顺风举帆，一日一夜便可至其南岸。而中国之衰微，亦必当自日本取得满洲开始，诚如是，则“朝鲜”、中国“次第可图也”。他主张欲攻取满洲，应首先攻占黑龙江地区，由北向南，陷松花江、盛京（沈阳），入山海关，占领江南。声言一旦“将中国纳入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罗（泰国）、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他还策划组建日本青森、仙台府兵攻击黑龙江，金泽、沼垂府兵侵占滨海地区，松江、萩府兵与博多府兵南北夹攻朝鲜，大泊府兵攻取琉球、台湾、台州、宁波等地，熊本府兵则随驾亲征，占领中国江南，用几十年时间征服中国；“统平满清，无南顾之忧”。他还主张“攻取吕宋（菲律宾）、巴刺卧亚（印尼）”，并以此二国为图南之基，进而出舶，经营爪哇（印尼）、渤泥以南诸岛。或结和亲以收互市之利，或遣舟师以兼其弱。于其要害之地，置兵卒，更张武威”。佐藤信渊提出了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纲领性蓝图和路线，这就是从侵略中国东北入手，进而入关全面侵华，征服中国，然后征服亚洲的西侵与南进并行的路线。这与 105 年后的 1927 年日本东方会议上制定的《对华政策纲领》是一脉相通的。特别是与被称为“田中奏折”而于 1929 年经南京《时事月报》披露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如出一辙。该“奏折”提出的侵略方针是：“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 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各民族，必敬畏我国而降服于我”。诚如宋成有教授所言，该“奏折”提出的侵略方针，不仅在思路上与佐藤构思如出一辙，而且在措词上竟然也大同小异。后者几乎是前者的仿写本或转抄件，个中微妙，令人深思。当然，关于‘田中奏折’的真伪问题，向来即有争论，尚有待将来取证。但是，自 1928 年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以后，日本军国主义策动‘九·一八’事件、侵占东三省、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偷袭珍珠港、兵侵东南亚诸国等侵略行动，完全将‘奏折’付诸实践，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佐藤信渊的思想著述，在其生前影响并不太大。而在明治维新后，却倍受重视，“维新三杰”之一的明治政府早期实权派人物大久保利通发现并特别重视和提倡佐藤信渊的思想主张。从 1871 年（明治 4 年）起，连续出版了信渊的各种著述。信渊的思想体系和主张，成了近代日本内外政策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而对其海外殖民扩张，乃至一统宇内的主张，更被作为军国主义的“高度国防体制的先驱而受到赞赏”。

比佐藤信渊稍小一点的水户藩（现茨城县）藩士藤田幽谷，也与佐藤的主张、思想相当一致，他曾在力陈“北虏（俄罗斯）之警”的同时，作诗言志道：“宇内至尊天日嗣，须令万国仰皇朝”。充分表露了其帝国意识、扩张思想和“皇化”世界，建立主宰世界的日本大帝国的思想主张。

曾师事藤田幽谷的会泽安（亦称会泽正志斋）在国体论、开国远略及国家膨胀之策等方面，与佐藤信渊并无不同。他主张日本是“神州”，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认为日本应“皇化”万国，抱有“使海外诸番来观德辉”的华

夷观念。正志斋以其著名的《新论》影响了幕末维新时期的许多志士。当时“幕末志士几乎无人不谈《新论》，《新论》成了攘夷运动的经典”。尊王攘夷论一度“风靡天下”，直接影响了一代志士。

如果说正志斋的《新论》“使武士作为志士而奋起”，那么吉田松阴的言传身教，则直接影响了明治维新的领导者及近代日本的建设者。吉田松阴兴办的“松下村塾”成了“孵化颠覆德川幕府之卵的保育场”、“点燃维新变革天下之圣坛”。倒幕维新及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如高杉晋作、久坂玄瑞、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前原一诚、山县有朋等，皆系松阴门人，其塾生达 80 人。其山鹿（素行）流派的兵学弟子共 300 人，为明治维新立下功勋之有爵位者、赠位者、有位者共达 37 人之多。伊藤博文后来为“松下村塾”题词道：“道德文章叙彝伦，精忠大节感明神。如今廊庙栋梁器，多是松门受教人。”必须指出的是，在松阴“开国攘夷”、“富国强兵”的思想中，始终存在着一股对外侵略扩张的暗流。由于松阴依然没有脱却将日本视为“神国”的传统观念，声称“凡生皇国宜知吾所以尊宇内”，决定了他的思想主张与佐藤信渊等的社会思想存在着一致性，亦具有当时日本先觉之士的通病。松阴提出：“俄、美讲和一定，吾方决不毁约（指幕末与西方列强所订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失信于戎狄……其间养国力，割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东北）、支那（中国）”，将失之于欧美的“交易之处”；“偿还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土地”。这种失之于西方者，补偿于鲜满的主张后来成为明治政府的一大战略。松阴不仅主张“开垦虾夷（北海道）封建诸侯”，而且主张赤裸裸的侵略扩张。他说：“趁势

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海，告谕琉球，使之会同朝觐，一如内地诸侯。且令朝鲜纳人质、进朝贡，有如古盛之时。北则割取满洲（中国东北）之地，南则收台湾、吕宋（菲律宾）群岛，以示渐进之势”，甚至还要占据整个中国乃至“君临印度”，从而“使神功（传说中的神功皇后）未遂者（传说神功皇后曾征朝鲜新罗而未遂，实是虚构的说法）得遂，丰国（丰臣秀吉）未果者（指其两次侵朝失败）得果”。

松阴这种“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力图将压迫强加在邻近国家身上的思想主张，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当中国鸦片战争抗击英国侵略失败之时，日本开明藩主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便主张侵略中国。他主张：“以今日之形势而论，宜先出师取清之一省，置根据于东亚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则英法虽强盛，或不敢干涉我矣”，“彼英法远隔重洋，尚不惮用兵之劳以取之，况我日本乎？”后来的“维新三杰”中之二人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正是由岛津齐彬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都成为明治新政府的实权派。他们又都深受齐彬思想主张的影响。

幕政改革派维新志士桥本左内，甚至公然认为，如果不兼并中国、朝鲜等国领土，“日本就难以独立”。故“略取附近之国家，乃第一要紧之事”。

幕末经世学派代表人物及一批维新先驱志士们，是日本当时的先觉者，但他们的思想主张中的对外侵略扩张思想又表露得如此清晰，如此狂妄，成为当时先觉者的通病。这种思想通病是日本武士的领土野心、武士道主张的“征战光荣”等必然产物，更是在幕末特定的国际国内时代条件下，受列强西力东渐危机的冲击而盲目接受西方强权政治、弱肉强

食的理论主张的结果，二者相结合，遂产生并形成了系统的对外侵略思想体系。他们企图通过模仿西方殖民者对外扩张的行径，侵略和掠夺弱小国家以臻富强，进而达到参与欧美列强的殖民角逐的目的。当时还只是思想和主张，虽然野心毕露，毕竟无力行动，只是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思想主张的源头。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行径除了一些新的历史条件和因素外，无疑正是这种思想的继承、发展和贯彻实施。

1868 年明治维新后上台的日本近代天皇制统治集团，更精心炮制了对外侵略扩张的蓝图，提出了他们所谓的“大陆政策”。“大陆政策”就是用武力向朝鲜和中国进行侵略和扩张的指导方针。明治年间（1868—1912 年）形成的日本“大陆政策”，确定了五个侵略步骤：第一期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期征服世界。明治天皇即位的 1868 年发表的《宸翰》（天皇御笔信）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表露了要用武力征服世界的狂妄野心。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指导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二是要实现“武国”观念，以武力作为立国的基础。这种“武国”的特色，就是崇尚军国主义，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的“荣耀”。由于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力的大多是封建武士出身的人物，他们充当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角。从道德观、人生观、世界观考察，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自幼皆深受武士道精神熏陶，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武士的

价值观念和行动准则理解和处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问题。武士道精神被继承和发展，成为维新领导人向日本国民，特别是向军队和学生进行灌输的最重要的伦理规范，在《军人敕论》、《教育敕语》中浸透着武士道精神，成为日本鼓吹军国主义和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集中代表。明治初年对封建武士阶级进行过改造，使武士等级不复存在，旧武士阶级迅速分化，但一批资产阶级化的士族作为明治时代的“新武士”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并成为主导力量。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士族，至1880年时，中央和地方官吏的74%仍是士族，说明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士族的手中。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统治集团中，其骨干亦是前武士出身者。最著名的“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及垄断政权近半个世纪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正义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的军部法西斯魁首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皆为士族出身。因而传播武士道精神的社会力量强大，“国权”、“国粹”思想流行，为其雄厚的社会基础，士族及士族出身者们极自然地成为推动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发展道路的社会力量。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就开始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这亦是世界资本主义早期发展的共性。各资本主义列强的产生、发展，多是在对外扩张、殖民侵略中进行的。日本更由于资本主义起步晚、又是资源缺少的国家，对原料、市场的需要，尤为急迫，加之本身又有军国主义传统，故而推行扩张侵略战争更猛烈、更持久。明治政府制定的“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